

《华尔街日报》为何又炒作“全球贸易战”？

“中国为何要启动新一轮贸易战？”《华尔街日报》最近以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写下了一篇很失水准的文章。其拿中国“希望通过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来恢复经济活力”做文章，认为此举将挤压世界各地的企业并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战的担忧。这个观点本身算不上新鲜，还是在炒所谓“产能过剩”的冷饭，只不过《华尔街日报》用更有煽动性的“全球贸易战”标签给它冲流量和带节奏。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歪理，对外开放的中国“有罪”，保护主义的美国反倒“有理”。它还下“指导棋”说，中国经济“需要从根本上反思”，“摆脱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过度依赖”，变得更像美国，才“有可能走上更稳健的增长道路”。不知道《华尔街日报》希望中国向美国学习什么？是以《通胀削减法案》搞歧视性补贴政策，还是连续阻挠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法官遴选，抑或对其甚至没有出口到美国的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关税？当《华尔街日报》以美国为“标准经济体”要求其他国家的时候，自己照镜子了吗？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进步不是偶然的。自2000年以来，中国研发投入平均每年增长14.2%，是美国的4倍。货物贸易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当然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进口国际市场份额也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二的位置。作为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环境下开展的国际贸易，出口情况从根本上取决于比较优势，其次受到外部需求的影响。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财经类专业媒体，中国制造业的这些实际情况《华尔街日报》不是不知，而是故意不说。

如此颠倒黑白、故意散播错误观点，《华尔街日报》除了专业水准堪忧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别有用心。今年以来，《华尔街日报》多次发表文章唱衰中国经济。美国这一轮对华所谓“产能过剩”攻击，《华尔街日报》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肉喇叭”角色，其目的无非是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找借口，给美国政府打压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做舆论动员。

然而，要说谁引发了全球对新一轮贸易战的担忧，恐怕没有国家会比美国更合适。2023年，WTO成员通报的技术贸易壁垒（TBT）措施达4000多件，其中美国通报的TBT措施为454件，排在它后面的5个成员通报的总数还要多。而根据WTO今年7月发布的监测报告，尽管面临保护主义压力，多数成员仍在积极促进商品贸易，减少或取消进口关税，废除或放松进口数量限制，贸易促进措施总数超过贸易限制措施。WTO认为，这显示出各成员对于保护贸易自由流动的强大决心。此外，能看到各成员利用WTO以及其他机制找到了解决分歧的办法。这些结论都清晰地说明，《华尔街日报》描述的那个到处是贸易摩擦的世界是虚构的，全球化大势没有变，是美国把车开倒了。

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不会损害全球其他国家，美国的保护主义才会。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可以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实现各贸易方的福利最大化。而保护主义往往导致通

胀高企、企业生产效率降低和生产生活成本上涨。那些被贸易壁垒保护起来的企业，将失去技术创新和优化成本的动力。而得不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市场需求就提振不起来，反过来进一步拖累企业。

我们注意到，《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提到WTO，此前相关文章也甚少提及。全球贸易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出现一些局部摩擦是很难避免的，关键是通过WTO规则机制来解决问题。无论是《华尔街日报》还是华盛顿，都没有资格越过WTO来给其他国家扣帽子。

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6.2%。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一些美国媒体，前一个月说中国出口下降“威胁世界”，后一个月说中国出口上升“威胁世界”。如果它们没能切身感受到来自中国进出口和投资带来的好处的话，那也是它们的心态和政府政策所导致的。它们需要躬身自省，而非诿过于人。▲



推动加沙停火，美国应放下私心

丁隆

8月2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了其自去年10月以来的第九次中东之行，“两手空空”返回华盛顿；总统拜登次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强调迫切需要达成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但连美媒都承认，他们为促成加沙停火所做出的“最后一搏”一无所获。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加沙局势中没有展现出任何停火可能，中东地区形势岌岌可危。

自去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已举行多轮谈判。斡旋方提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的三阶段停火协议一直摆在谈判桌上，但冲突双方在停火协议关键细节上的分歧，使每次谈判都功亏一篑。近日在多次重新启动的停火谈判再次燃起国际社会的希望，但未见有成果，各方转战开罗继续谈判。

本轮谈判是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遇刺，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卷入冲突的背景下举行的。斡旋方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希望本轮谈判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在中东局势千钧一发之时力挽狂澜。除哈马斯拒绝参加直接谈判，以色列、美国、埃及、卡塔尔都派出高级别官员参加，足见各方重视程度。然而，就目前形势看，由于“堵点”依旧，开罗谈判阴云笼罩，前景难言乐观，被各方寄予厚望的谈判或将难逃无疾而终的命运。

由于美以间的特殊关系，美国无疑是可以对以色列施加最大影响的国家。但看美方官员四处奔波、忙前忙后，也并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本周，在两天时间内，关于加沙停火谈判的进展和各方态度，布林肯和拜登就释放出相互矛盾的信息，有埃及媒体直言，

“美国正试图扮演一个摇摆不定的指挥者角色”，让国际观察家感到困惑，也加深了相关各方之间的互不信任。美方对巴以冲突及停火谈判发出了一系列混乱的信号，纵容了以色列的强硬行为。一方面，美国的斡旋活动出于私利，主要是受其国内政治利益驱动；另一方面，美国在巴以冲突中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政治、军事和经济援助。在停火谈判关键期，美方批准向以方提供多达200亿美元援助，并向中东大量增兵。如此“拉偏架”和私利驱动的斡旋行动，不但无法结出善果，还使美方“公正斡旋人”的人设坍塌。

本轮巴以冲突已延宕近11个月，造成加沙地带4万人死亡，近10万人受伤，成为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场冲突还波及中东多地，其外溢效应持续推高中东地缘政治紧张态势，使中东成为随时燃爆的火药桶。在22日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中方明确表示，迷信通过军事手段在加沙地带实现“完全胜利”只会造成更多无辜平民伤亡，不会为解救被扣押人员创造条件，也不会为以色列和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宁。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落实“两国方案”是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拿出真诚、公正、负责任的态度，推动以色列尽早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平民的杀戮。

美国应放下私心，真正为实现停火做点事。国际社会也应为争取和平付出最大努力，在加沙冲突将满一年之际，尽快为这场血腥的冲突画上句号。▲（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于9月4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近日，多家非洲媒体发文回顾双边合作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期待能够借由这次加强中非友好团结的盛会，不断拓展合作新领域，共谋发展新篇章。

中非合作助力非洲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真心欢迎。但同时，一些西方媒体又在试图炒作中国对非“债务陷阱论”，对中国和中非关系进行污名化攻击。需要明确的是，

目帮助当地解决了水资源不足问题；塞内加尔乡村井水项目缓解了当地缺水问题；中非发展基金为马里的人福非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支持，缓解该地区药品供应不足的问题。

较之于中非积极展开友好合作，美国等西方国家才是非洲陷入债务困境的始作俑者。回溯历史，美国是非洲奴隶贸易的受益者，欧洲是非洲的殖民者。几个世纪的掠夺与剥削破坏了非洲的本土结构，埋下了种族冲突与贫困落后的种

中，13个国家面临债务困境的高风险，6个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困境。

尽管不是非洲国家的主要债权人，中国仍积极参与非洲国家债务问题的处置，以促进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在G20缓债倡议的多边框架下，中国积极参与了对赞比亚等国的个案债务处理，以平等协商的形式，帮助相关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决不以逼债为由寻求任何私利，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债务处置上的本质区别。同时，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框

中非合作有力回击“债务陷阱论”

宋微

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住的，中国发展融资促进了非洲的减贫和发展，同时中国愿意在非洲陷入债务困境时帮助其探索解决方案。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在过去的24年间，中国通过援助、投资和贸易“三驾马车”，同非洲共商合作，实实在在地拉动了非洲的现代化进程，也赢得了非洲伙伴的广泛认可和赞誉。中国通过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帮助非洲建设大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同时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也积极为非洲国家铁路、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支持。例如中国融资支持的尼日利亚阿卡拉铁路是该国第一条投入运营的标准轨铁路，完善了当地的交通运输体系；中国融资支持的毛里求斯拉姆古兰爵士国际机场扩建项目提高了旅客接待能力，构建了从亚洲通往非洲的空中交通枢纽。中非发展基金对非洲融资总额已超过66亿美元，涉及39个非洲国家，同时促成中国企业对非投资总金额达到310亿美元以上。此外，中国政策性金融还支持非洲民生事业的改善。例如，中国融资支持的喀麦隆雅温得市萨纳加饮用水处理厂项

子。尽管二战后非洲国家相继实现了独立，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和盘剥。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造成非洲贫困的根源是非洲宏观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因此在西方国家主导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非洲提供了一系列以宏观经济改革为条件的贷款，由此导致非洲陷入了长期的动乱，非洲不但没有实现发展，反而还出现了倒退。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国家过早将非洲推向全球资本市场，由此导致非洲国家过度举债，也造成目前非洲的外债比例极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2023年国际债务统计数据显示，商业债券和多边债务占非洲外债总额的66%，中非双边债务仅占外债总额的11%。其中非洲国家2013—2019年发行的十年期欧洲债券息票率为4%—10%，长期债券较少，在较高利率和还款期限短的双重影响下，第一个偿债高峰在2023—2025年到来，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将非洲推进了“债务陷阱”。根据非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在有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数据的38个非洲国家

架下已经免除了17个非洲国家截至2021年底对华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然而必须承认，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靠“发展”，只有帮助非洲解决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才能从根本上将非洲国家拉出债务困境。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多项指标在非洲进展缓慢。截至2023年底，除气候行动目标以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目标在超过半数的非洲国家取得进展外，其余15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中指出，非洲每5人中就有1人面临吃饭难问题。基于此，中国将继续帮助非洲解决发展难题。

中国从来不是非洲债务的主要债权人，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向非洲提供了一揽子的援助举措，进行了无私的支持。无论是“十大合作计划”，还是“八大行动”和“九项工程”，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都如雨后天春笋般发展起来，也由此为非洲的减贫和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